

原来他乡是故乡

——莱、牟的故事

王宏章

我的故乡在莱芜，我在烟台工作。老人经常说我离家远，我就开玩笑——来烟台也是“回家”，只不过隔了几千年。莱芜不大，古称“嬴牟”“莱牟”，有牟子国遗址、莱人遗迹；烟台挺大，有“东莱”“东牟”的区域称呼，有莱子国遗址、牟子国遗址。至今“莱州”“牟平”这些带“莱、牟”的地名，让我听着亲切——这亲切背后跨越400公里和2500年的时空轮回。

接下来，沿着文物古迹线索，讲一下牟子国东迁和莱子国西迁的故事。

莱芜东的牟子国遗址，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初中就读的莱芜区辛庄镇赵家泉村，靠近大汶河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“莱芜，牟，故国”。《莱芜县志》载“牟子国故城，在县治东二十里，牟汶曲中”。考古材料显示，该故城遗址呈长方形，面积约40万平方米，城墙残高3-5米，夯土层清晰可见，出土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器、铜器等文物，其中鬲、豆、罐等陶器具有典型的东夷文化特征，印证了牟子国早期在此的活动。

烟台牟子国遗址在福山区古现街道办事处三十里堡村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民国版《福山县志稿·沿革》转引《路史》记载：“齐忌牟逼近临淄，乃迁牟于东海，牟子国在今福山县牟城社。”清光绪《登州府志》提到：“牟城在（福山县故城）西北三十里，春秋时为牟子国国都，遗址尚存。”考古材料显示，古城遗址约25万平方米，城墙为夯土构筑，现存城墙根部宽20米，顶部宽16米，高度6-8米不等。虽未进行过考古发掘，20世纪60年代农民整地时，已有钱范、刀币、铁犁、石磨、瓦当、陶器和冶炼残渣等出土，足以证实当年牟子国国都人烟稠密，手工业发达，商业繁荣。牟平区观水镇一带也发现大量牟子国遗址，遗址内发现了多处居住遗址和墓葬群，出土的铁器制作工艺精湛，与文献记载中牟国高超的冶铁技术相吻合，同时还发现了带有“牟”字铭文的青铜器，为确定牟子国东迁、再迁后的都城提供了关键证据。

关于牟族，有人说是来自青藏高原，有人说是东夷族分支牟族发展而来。当年牟族人跟随姜子牙伐纣有功，姜子牙为之复国。牟子国夹在齐鲁之间，先附鲁后被齐控制。公元前567年齐灭莱后，牟子国被迫东迁，先至安丘，后于公元前558-前548年间迁至今福山。打开地图看，磁山（牟山）、泰山夹着分叉的夹河，地形地貌很

像臀部，有传说“脛县”因此得名，也就是现在的开发区古现。我老家方言，称呼屁股为“脛脛子”。后牟子国被齐灭国，族人继续东迁到养马岛附近。汉代韩信因牟国被平的往事，把“脛县”改称“牟平”——注意哦，不是今天的牟平——今天牟平一带被叫做“东牟”。南北朝时期，这个牟平被撤销。唐朝时改东牟为牟平。宋金时期，伪齐政权代伪齐帝刘豫登山望远，显然这个“二鬼子”审美情趣较高，在他眼里曾被视为“脛脛子”的两水镇一带为“福地”，故名山为“福山”，金天会九年（1131年）置县，故名“福山县”。当代地名，大致定型。

烟台莱子国遗址，在龙口市归城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杜预注《春秋》载“夏，公会齐侯伐莱”，释“莱国，今东莱黄县”。考古资料显示，该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，是目前发现的最大莱国遗址，出土“莱伯作鼎”等带铭文的青铜器以及大量兵器、礼器，展现了莱子国的强盛。莱子国早在殷商时期便已受封建国，是殷商旧族。莱人作为东夷人打架很猛，大家看“夷”字就是“人+弓”，拥有并擅长操控远程武器，代表人物后羿，把太阳都给射下来了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记载：“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，封师尚父於齐营丘。东就国……莱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。营丘边莱。莱人，夷也，会纣之乱而周初定，未能集远方，是以与太公争国。”这就是著名的“莱逼营丘”，姜子牙也拿他们没办法。直到公元前567年冬，齐灵公亲率大军攻破莱都，莱子国亡国。齐国还采取了“迁莱于郕”的政策，彻底杜绝了莱国复国的可能。一部分遗民迁到淄博，《水经注》引汉莱芜县令范冉的话：“齐灵公灭莱，莱民播流此谷，邑落荒芜，故曰莱芜。”

莱芜故城位于淄川区太河镇城子村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“夹谷会盟”的“夹谷”即“莱芜谷”，“莱人作乐”是当时的礼仪。后来莱芜区划几经变化，成了“莱芜市”，并入济南后列区，牟子国所在地已经变成钢城区。鲁中地区的莱子国遗址较少，主要在淄博、

潍坊交界地带发现少量遗存，出土了具有莱夷文化特色的夹砂陶器和玉器，反映了莱子国西迁前与鲁中地区的文化交流，不再列举。

综上，莱和牟两族人在莱芜土地上大融合。《炎黄氏族文化考略》载，“今之莱芜，即莱、牟两族合名”。

我这个土木专业的工程师，误打误撞从事了文物工作后，慢慢培养了搜索文物的目光。今年“五一”期间，我专门回了初中所在的那个村，满眼的文物遗迹，土坯墙里都是陶片。村里大姐带我看了一些她小时候所看到的文物，并痛心疾首于文物保护滞后，“三十年前保护就好了”。大娘也说“以前的地根本没法种，到处是挖宝的，白天撒种晚上就被翻了”。聊天时，我说：书上说“牟”和“莱”是一个意思即大麦，但我觉得更像耕牛，你看“牟”字多么像牛上了枷担（拉犁时的枷具，放在牛肩膀上，类似钝三角形），而且发音也像牛叫。有了耕牛农业就发达，咱们村应该粮食产量高吧。大姐说：是啊，我们这边是当初交公粮最多的，是镇里的小平原，咱们村里的媳妇都比外面漂亮，姑娘们都愿意嫁过来……

今人的幸福，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，先人开荒，整平耕地，把地种得熟了，麦子黄了几千遍，就到了今天。或许，这就是文物工作意义之所在，链接祖先，知道从哪儿来的，才知道朝哪儿去。

那个村曾经叫作“围子”，即合围的城墙。我站在已是耕地的“围子”上，密密麻麻的都是陶片。每一步都能踩到，有的薄，有的厚，有的花纹细，有的花纹粗。我忽然就有点感动，2500年前，这些前辈就在这汶河打水入瓮，又用陶碗舀着喝，水面倒映着他们的笑容。

我捡了些陶片，和福山博物馆馆长视频，期待将这些陶片带给福山博物馆，比看一下古牟子国的莱芜遗址陶片和烟台遗址陶片——万物有灵，陶片能语，这也算山与海的省亲。相逢可不得喝点，左手“鲁菜白干”，右手“烟台古酿”，但使主人能醉客，原来他乡是故乡！

烟台故事

日寇侵略的铁证——烟台山上的“战绩碑”

曲德顺

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修建了大量“忠魂碑”“战绩碑”。魏春洋先生曾在《烟台晚报》发表《烟台山铁证》一文，披露了所谓“战绩碑”的建造背景与过程。现结合日伪时期的史料，进一步揭露该“战绩碑”的前期筹款及揭幕仪式的一些细节，以期为读者还原更完整的历史图景，深化对这段屈辱历史的认知。

强制摊派

烟台濒临黄海、渤海，自甲午战争以后即被日方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地。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后，1938年2月日军便占领烟台，并逐步推行殖民化政策。1939年，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烟台山修建所谓“战绩纪念碑”（也称“忠魂碑”），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例。

魏春洋《烟台山铁证》一文中指出，“战绩碑”耗资巨大。这笔费用除了捐款外，还通过烟台日伪政府对商界进行强制摊派。

1939年10月30日，《鲁东日报》发文，详细记载了摊派经过。报道显示，当时的烟台伪市政府召开了市署、警务局、教育局、贸易市场等各部门和社会团体的会议，“经众讨论，拟在北山建立忠魂碑一座”，建造资金由市政府承担五分之一，其余五分之四则由商会负担，二十日内筹齐，以便尽早开工建设。事实上，当时“战绩碑”已经开工建设，此次会议讨论“建设事宜”不过是走走形式，唯有强制缴纳钱款是实打实的要求。11月19日《鲁东日报》公布的具体筹款金额：市署捐100元，警务局200元，财政局100元，建设局50元，教育局40元，贸易市场100元，情报宣传室20元，鲁东道公署180元，海关监督公署25元，税务司署60元，邮政局50元，威宁盐场硝磺处75元，统税分局200元，而市商会则被迫捐出高达4800元，悉数交由日本海军陆战队支配。

由此可见，所谓“民间自发”捐款实为日伪当局强制摊派，其性质与掠夺并无本质区别，“战绩碑”的建造费用绝大多数来自对商会的强制摊派。

选址施工

“战绩碑”在1939年8月由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修建，由大连“三田组”承建施工。该公司

在华期间承担了多项殖民建筑工程，包括烟台日本领事馆及其官邸等，堪称日本在山东推行殖民建设的重要承包商。

日军对“战绩碑”的选址颇费心机，“战绩碑”位置系占用东海关税务司官邸的用地，事后日方自诩得意，称“战绩碑”所立的位置“在烟台山之巅，北靠渤海，南望南山，远至几十里外皆可瞻仰”。碑体正面刻“战绩纪念碑”五字，出自日本海军中将日比野正治之手。该“战绩碑”题记文字目前未见于现存史料，结合日方同类“战绩碑”惯用表述推测，其内容应是记录日海军陆战队侵占烟台过程、鼓吹“战绩”并彰显“军威”之类的文字。

从选址到碑额书写，均体现出日方的象征意图：一方面凸显“军威”，另一方面以视觉和空间的压迫感形成统治象征，使烟台市民时时处于其心理威慑之下。1940年1月9日，《鲁东日报》刊登消息称，将于1月12日（后改为13日）举行“战绩纪念碑”揭幕典礼。

仪式依照神道教礼仪进行，程序烦琐，全程反复强调所谓“战功”。这一典礼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。通过宗教仪式与军事力量的结合，日军意图在精神层面塑造其统治的合法性。

后续活动

“战绩碑”竣工后，迅速成为日军在烟台祭祀和庆典的核心场所。1940年10月，碑前举行祭灵仪式；1941年1月，举办元旦庆祝活动；1942年7月，则举行所谓“大东亚圣诏”纪念典礼等。这些活动均伴随对普通市民的强制动员。通过反复的集体仪式，日军试图将侵略包装为“正义之战”，并在心理层面制造所谓“尊崇”与“敬畏”。这种手法在日本殖民地与占领区屡见不鲜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。

烟台山上的“战绩纪念碑”，既是日本侵华的直接产物，也是殖民统治的象征。它的建造与后续活动，清晰揭示了日军在占领区推行的政治逻辑，以军事威慑为核心，以经济摊派为支撑，以文化操控为辅助。今日追溯这段历史，通过对事件细节的挖掘、呈现，为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，为“历史不容篡改”提供了有力注脚。这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还原日本在烟台的侵略行径，也为“历史不容篡改”留下铁证，时刻警醒后人保持对侵略历史的清醒认知。

